

我观党史

石仲泉 著



济南出版社

我观党史

石仲泉 著

济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观党史/石仲泉著. — 济南: 济南出版社, 2001. 4
ISBN 7-80629-587-9

I. 我... II. 石... III. 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
IV. D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0172 号

责任编辑 刘永凌

装帧设计 戴梅海

我 观 党 史

石仲泉 著

出版 济南出版社

(济南市经七路 251 号 邮编 250001)

发行 济南出版社发行部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36.75

字数 922 千字

版次 2001年7月第1版 2001年8月第2次印刷

印数 2001—5000

书号 ISBN 7-80629-587-9/K·31

定价 78.00 元

(如有倒页、缺页、白页,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石仲泉,男,1938年出生,祖籍湖北省红安县。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64年于该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业研究生毕业。现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兼《中共党史研究》杂志主编、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长、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会长,为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党校、军校兼职教授。

石仲泉长期在中央机关从事理论和党史的研究,勤于著述。个人专著有:《怎样认识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的艰辛开拓》、《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导论》、《周恩来的卓越奉献》、《当代中国的邓小平理论》等。曾具体负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的编写和修订。参与主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的编写工作等。负责主编的著作有:《毛泽东研究述评》、《邓小平论中共党史》、《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共和国缔造者》画文丛书等。参与主编的著作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全鉴》等。其中,《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等曾荣获国家图书奖等奖,《共和国缔造者》画文丛书荣获中国图书奖,《总结历史经验的典范——学习历史决议》等10多篇论文获国家级的优秀论文奖。

再版说明

这部 90 多万字的“大书”第一次印刷 2000 册，在短短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已告罄！

这给了我们巨大的惊喜和鼓舞。

作为一个出版者，最大的心愿莫过于把优秀的图书精品推介给他所热爱的读者，以使您的阅读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石仲泉先生是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著名党史专家，《我观党史》是他数十年研究党史殚精竭虑、辛勤耕耘而成的心血结晶，所以，出版这一巨著，使广大的读者看到它、喜爱它，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而我们的读者给了我们最好的回报。令人振奋的绝不仅仅是这本书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更为重要的是，有这么多的人那么真诚而热忱地关心、支持党史工作，那么真诚而热忱地关注我们党 80 年波澜壮阔的历史，我们知道，这一切，无不是基于对我们党的真诚的热爱。

我们将更加坚定地走多出精品、快出精品的出版道路，相信广大读者会一如既往地给予关爱。

编 者

2001 年 7 月

编者寄语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光辉而又艰辛的 80 年历程。在党的 80 华诞来临之际,人们都在选择适当的形式以纪念这一伟大的节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作为出版部门,最好的选择莫过于适时地出版一些高质量的党史著作。为此,我社不失时机地向广大读者隆重推出国内资深党史专家石仲泉先生的力作——《我观党史》,以表达我们对建党 80 周年的良好祝愿。

作为国内党史和党的文献权威研究机构和社团机构的负责人,石仲泉先生在长期从事党的文献、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中共党史研究以及教学的过程中,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思维,形成了自己鲜明而又系统的党史观。他在党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一些重大成果,虽然不断地以论文和著作的形式展现给了读者,但这部 90 多万字的巨著——《我观党史》,却是他对党史问题进行系统、深入、具体研究所取得的成果的整体再现,是他以往所取得的思维成果的再度升华。因此,他的这部著作的出版虽然恰好作为党的 80 华诞的礼物而奉献给大家,但决不是为了纪念这一节日而仓促上阵的应景之作,而是他数十年殚精竭虑、辛勤耕耘而成的精品。

自从 1926 年党的创始人之一蔡和森在中共旅俄支

部会议上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这篇5万字的报告,从而有了中国共产党人研究中国共产党史的第一部著作以来,研究党史的论文和著作可谓汗牛充栋,无论是有关党的通史、断代史,还是专题史著作,都不乏精品之作,如《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等,但石仲泉先生的这部著作在既非通史、断代史,又非专题史的新的视角和框架下,为党史研究领域增添了一部扛鼎之作。治史必须有明确的目的和态度。孔子作《春秋》是为了“绳当代”,司马迁著《史记》是为了立“仪法”,司马光编《通鉴》是为了供“资治”。《我观党史》研究党史的目的和态度,就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从而以史为鉴。这就使著作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历史研究必须着眼于揭示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不能局限于描述历史的细枝末节,正如邓小平所说,宜粗不宜细。不仅要展现历史的本然,更应追寻历史的所以然。石仲泉先生的深厚的理论功底,使这部著作在这一方面显得更具功力。历史研究还必须体现时代精神,既要有厚重的历史感,又要有强烈的现实感,要站在现实的高度去反思历史,而反思的目的是为了未来的发展。这部著作始终坚持了这一原则。一个突出的事例是,著作不仅以较大的篇幅阐明了江泽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还用“三个代表”的思想去解读中国共产党80年的历史,这就使人们既对“三个代表”思想的理解有了坚实而深厚的历史基础,同时对党的历史的认识又上升至从未有过的崭新的高度。在中共党史人物的研究

中,很多研究者对历史人物的个性特征缺少细致的探讨,很多党史人物在党史著作中可谓千人一面,为此,胡乔木和胡绳曾多次指出,要写出一本有特色的中共党史,要像司马迁写《史记》那样有声有色,变历史为一个人物画廊,这就要求把人物写活、写真,写出个性。这部著作对党史人物的评述可以说有了很大的突破。不仅如此,作者还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对重要的党史人物尤其是党史人物关系中一些令人疑惑的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另外,在党史研究中,对党史理论和方法的探讨虽然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但近几年一直进展不大,这部著作对党史研究的指导思想、理论原则乃至具体方法,都有详尽而又科学的论述,为党史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支撑。

总之,这是一部值得各个层面读者认真研读的高质量的优秀党史著作。适逢建党 80 周年之际,推荐给大家。相信阅读此书的意义将远远超出纪念活动本身。我们期待着。

刘永凌

2001 年 5 月于济南

前 言

(一)人的一生应怎样度过?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保尔·柯察金对此作了一个伟大共产主义战士的回答。他的回答,曾经激励着像我们这样的 50 年代的年轻人去追求革命的理想,奉献火热的青春,也鞭策着我们与时代共进,在任何情况下都努力干点事情,不要虚度年华,不要碌碌无为。

我始终把保尔的名言作为人生座右铭。虽经历了历史的波澜曲折和岁月的沧桑巨变,没有能成就什么“显赫”,但也无怨无悔。因为在那大动乱的年代里没有“弄潮”,在改革开放波涛汹涌的大海里没有“呛水”;几十年来,干工作甚为投入,“爬格子”心满意足。生就的这个料,该干这样的事,没有其他非分之想。

作为学林中人,我惟一的遗憾是感到学术生涯短暂。我很羡慕一些大师大家们或 50 年,或 60 年,甚至 70 年的学术生命。其实,鄙人花甲刚过,按常理言,不去奢望什么从事学术活动 60 年、70 年,但 40 年、50 年总是可以的。然而今生无望矣!因为在北大读本科和研究生毕业后,就赶上了“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真正的学术生涯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的。迄今 20 年过去了,已华发满头,怎么还可能再有 30 年的学术生命呢?不用说学术生命,就是自然生命能延寿如此,那也该谢天谢地了。目前已届退休之龄,也不恋栈,只求能有较多的学术研究时间。禄位一长,忙于应酬,就很容易忙成碌碌。因此,在夕阳黄昏龄段要与时间赛跑,争取使相对的学术生命能延长 10 年、20 年!

(二)时下有的年轻人强调人生自我设计,在半个世纪前是不可想像的。这也难怪,此一时彼一时,原因多多。充满幻想,抱负远大,不必指责。比如我是学哲学的,作为北大学子,当然想在哲学方面有所发展。但是人生之旅如同历史的走向一样,是合力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单凭主观意愿就能决定的。因此,我出了燕园哲学楼阁,几经辗转,数十年后,根植于党史天地。这是当初没想到的,也从未作过这样的设计。这真有似“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但我无陆游那样的经历,因而也无他那样的沧凉感,还能随遇而安。

我没有直接从哲学之门跨入党史之家,其间经过了这样几个过渡性的转换。

第一站是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这是1964年中央书记处为了“反修防修”成立的专门研究理论的一个综合性工作部门。我一毕业就到这样的机关,感到受益较大之处,是我开始跳出象牙之塔,接触点实际,了解点政治,有助于拓宽观察视野和思考空间。“文化大革命”十年之久,对国家来说,造成了深重灾难,耽误了一代人的成长。这是难以挽回的。但是,对于像从事我们这样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来说,一点不经风雨,不见世面,则是一个缺陷。因此,对有些事要辩证地看,尽量地从所经历的不好的事中得到教益。光是埋怨、咒骂,没有任何用处,要善于使之转化成财富。

第二站是首都钢铁公司。在1969年,我们那个研究院“斗、批、散”后,我被分配到首钢运输部机务段做钳工。就干活来说,很单调,很脏乱,劳动条件比较艰苦。特别是从家住的颐和园地区到厂里去上班,单程骑车至少100分钟,若碰着风雨雪天则需两个小时以上。这种生活当然苦不堪言。好在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受得了这个苦。到首钢劳动,是这辈子对现代工业、大型工厂和产业工人的惟一一次长时间的体验和考察,从而,按照现在的说法,对什么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

第三站是北京市宣传教育系统。“九一三”林彪事件以后,对我们这些人也开始落实政策。1973年10月,我被分配到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即西城区委党校当理论教员。差不多一年后,又被调到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在这里工作了五个年头。这一经历使我对宣传理论工作有了一定了解。“四人帮”横行,形而上学猖獗,理论宣传难搞。在这样的机关工作,杂勤事务极多,如果个人不努力,很容易成为“混混”。

第四站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79年初我调至该单位时,这里还叫“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1980年才改为现名。最初是在近代史组,帮助胡绳同志整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这使我对中国近代历史有了较多了解。随后参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工作,以及负责《历史决议注释本》的工作。这使我对于从宏观上把握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社会主义的曲折发展历史受益匪浅,甚至可以说是终身受益。这以后又从事了一段我早就向往的并在北京市委工作时已开始进行的周恩来研究,了却心灵深处的“情债”和“文债”。那本《周恩来的卓越奉献》主要是这个时期及其以后的研究成果。1984年开始主持毛泽东思想理论调研组工作,直到机构改革时这个组撤销。整整八年,使我有机会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以及党的历史进行了较多研究。《毛泽东的艰辛开拓》主要汇集了这些年的研究成果。从1991年9月开始,主要精力放在参与主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的编写。这一任务直至1994年9月该书出版后才大体结束。这一段工作,除一些组织领导方面的事务外,主要是研究档案文献,撰写所承担的“初拟稿”专题,并负责统改这部分书稿。三年的潜心研究,使我对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特别是对抗日战争时期党内斗争的历史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这对于后来到党史研究室工作,由在文献室主要从事党史人物研究转向主要从事党史事件研究,有很大帮助。

第五站就是目前所在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这也是我工作的终点站了。我是1995年初正式调来这里工作的,实际上在1994年9月西安召开的全国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讨会期间,就被邀请参加了胡绳同志主持的关于建国后党史编写大纲的讨论。如果说从学哲学转到研究党史带有某种偶然性,那么从上述经历,就不难在乍看起来的偶然之中找到其必然性的轨迹了。调到党史室时,胡绳同志交待明确:负责编写建国后的党史本子,再管一下刊物。近六年来,就是干这个工作。前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邓小平理论》一书,就包括了这一段结合研究党史所研究的邓小平理论的成果。如果说这些专著多属于牺牲了节假日和晚间娱乐,以及双休日而转化成的业余研究作品,那么我和我的同志们最关注、最看重的还是这些年更为呕心沥血而编的党史中卷本子。为了它,翻阅了数不清的材料,开了数不清的会,改了数不清的稿,写了数不清的字,特别是在那集中封闭统改中卷党史稿的108天里,大伙儿真可谓“食不甘味,寝难入眠”。我们是那么盼着它早日面世啊!写建国后党史的那个本子,也许还需要更多的砥砺磨合,不过,可能会得到欣慰的是,已历时四年研讨修改,又经过两年由各个方面的学术前沿专家逐章讨论了两遍的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即《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修订本,相对而言,也许会比较顺利一些。好在主编的《中共党史研究》杂志,由于编辑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和全室上下的鼎力相助,还有广大作者和读者的支持与关心,走在了党史期刊的前列,连续数年被评为“百种全国重点社科期刊”,获“全国优秀社科学术理论期刊奖”和“国家期刊奖”。在长期辛劳之后,也能从中获得一些慰藉。

(三)我常想,学问中人的生命价值在哪里?过去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不是我们这些人的追求。历代志存高远的读书人都崇尚这样一种人生坐标:立功、立德、立言,奉

之为“三不朽”。这里姑且不去分析历朝历代宣扬它时曾经赋予的具体内涵,而从继承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传统这方面来看,还是蛮有积极意义的,也是我们今人应该借鉴的。不必摆那些豪言壮语,也不必讲那些经过规范了的标准化语言,对于像我这样的学究来说,一个很实在、具体的目的,就是:如果立功无机缘,那么立德以正身、立言传后代,是可以自律的。肉身皮囊终要化为灰烬,求索立言则可超越时空。成天“爬格子”,把学问中所思、研究中所获——灵感的火花,认识的新知,转化成书面文字,就是希望著书立说留青史。

“这是要成名成家!”多少年来,这是套在莘莘学子们头上的“紧箍咒”。据说,解放前,对知识分子还少有这样的批评,那么,为什么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工人阶级成了国家主人,而知识分子又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新社会,这样的批评竟盛行几十年,压得一些被批评者喘不过气来,只能夹着尾巴做人?原因甚多,其中重要一点是认识的错位。一方面,把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对象的资产阶级泛化了,即把许多不属于资产阶级的当作资产阶级思想加以批判;另一方面,又把本属于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排除在工人阶级之外,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名成家”被认定为资产阶级思想,故在批判之列。其实,在建设了这些年社会主义的中国,真正有大名者、为大家者,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知名度不是抽象的,是靠它的历史、靠它拥有方方面面的无数大家来支撑的。在一个成天批判“成名成家”、害怕“成名成家”的环境里,能使科学文化飞快发展,那才是咄咄怪事!当然,就知识分子个人而言,应端正思想认识,胸怀祖国,心系人民,不要去计较区区小利。这是一个加强教育的问题,无关宏旨。好在改革开放以来,这个“紧箍咒”不那么厉害了,其他方面的条件有很大改善,许多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创造性有了发挥的空间。这是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其实,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要在学术上有所建树,“成名成

家”，是一种历史责任感，一种文化传承感。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没有中断，古代诸子百家之说至今仍是研究对象，这与知识分子的参与和点点滴滴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当然，个人想传承和在历史上能否传承，是两回事。个人想传承者如“恒河沙数”，五千年文明则大浪淘沙。但历史似是无情却有情，只要在某个方面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增添了颗粒者，历史是不会忘记的。

（四）我从学哲学转而研究党史，经常碰到这样的诘问：利焉，弊焉？从继续研究哲学理论的当年同窗来看，这是由形而上转到了形而下，由距离政治纷争较远的殿堂转到了陷入政治纷争的尘世，因而带贬之口吻者多。但在长期研究党史的同事们眼里，我这个专业转换似成为了一种优势，因而投以褒之目光者较多。我个人的感受是利弊参半。

此话怎讲呢？前已说明，搞党史并非我第一选择，否则，报考北大时就会攻读党史专业。但是，人生之旅至此，则应当“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扬长补短，营造安身立命之基。平心而论，从研究哲学转而研究党史对我还是有很大帮助的，目前个人在党史研究方面的优势主要得益于哲学。比如，研究的宏观视野、理论思考、辩证分析、创新意识等，受过哲学训练者，在这方面就可能沾点便宜。但是，事情总是相反相成，有利必有弊。学哲学者，其长处在抽象概括的理论思维；其弱点也很明显，如对历史典籍研究少，对具体史实缺乏精确的记忆，叙史多有议论而不善春秋史笔，等等。也就是说，治史的基本功尚欠缺。从治学的根儿上说，这就是非读历史科班生的缺陷。因此，若需“更上一层楼”，“补课”犹为未晚。

研究党史的上述优点和缺点，基本上反映在这本党史文集之中。这本文集辑辑了这些年研究党史的主要著述、发言之类。按照论述类别，大体分为六编。

——第一编，属总论类，有九篇文章。一组是学习邓小平关于

中共党史的论述的一些认识；另一组是学习江泽民关于党史工作指示信的体会，并将新作《“三个代表”思想：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新总结》一组文章归入此编。

——第二编，为党史理论研究。有七篇文章和学术报告，主要谈对邓小平理论和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发展的一些看法。

——第三编，为党史人物研究。有 17 篇文章，绝大多数是到党史研究室后写的，包括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张闻天、李立三、胡乔木、胡绳的一些研究。这类文章比较着重这样两点：一是思想比较研究，二是人物关系研究。

——第四编，主要为党史的“史”的专题研究，有大小 18 篇著述。研究民主革命（主要是抗日战争）时期党史的，有三篇；属于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内容的，有十篇；此外，属跨时期专题的，有五篇。这反映了这些年研究的一个实际情况：重点在社会主义时期。

——第五编，为党史讲话，共 23 篇。这是这些年具体主持修订《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和具体负责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稿的一些讲话和报告。这里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修订”，有 17 篇在讨论会上的发言；第二部分为“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的写作”，有六篇材料，包括信文、讲话和报告。有的讲话，虽然不完全是党史，但可了解党史本子的修订或写作情况。

最后一编，主要为短评、短论之类，有 18 篇。绝大部分涉及党史，也有一点个人抒怀。

以上六编，大大小小，林林总总，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基本上能反映我目前的党史观。故书名曰：《我观党史》。

（五）搞研究，我很赞赏邓小平倡导的“讲新话”。江泽民总书记不断强调的“创新”精神，也包含这个意思。这是研究人员，包括

党史研究工作者必须具备的一个基本素质。不讲“新话”，没有“创新”精神，那党史研究怎么能前进呢？

应当说，这20多年来，我们党史工作者讲了不少“新话”，因而才有党史研究的空前繁荣局面。但是对于目前琳琅满目、眼花缭乱的党史图书市场又不能不作具体分析。既有可读性很强、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书刊，也有粗制滥造、为许多读者所不屑顾的书刊。

就研究性和纪实性著述来看（这里只论政治导向没有问题，文风严谨，编辑负责的著述），属原创性的，既有一些独特的理论观点，又有翔实的鲜为人知的第一手原始资料者，难得多见。这多为长期辛劳的笔耕之果，为广大读者所青睐。另一种为编撰性（非指编纂性）著述，在图书市场俯首能拾。这类著述有它的功劳，比如“集大成”呀，“体系化”呀、“通俗性”呀，不可不加区别地一概“棒杀”。既然要加区别，那么就不能不说一下某些攒得不好的书。这类书多是将原创性著述或市场销路好的作品加以剪裁，然后重新编排组合，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可攒出厚厚的一卷本、甚至多卷本著作。由于没有研究，由于缺乏责任，这类书往往错误甚多。作学问，作学者，要想在青史上留点什么，让后人可以咀嚼一下，切不可使自己成为攒书匠。

（六）我自认为搞研究还是投入的，坐得住，能耐寂寞；有钻劲，想说点“新话”。“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这句话颇富哲理。写文章就是要苦思冥想，找点新视角，讲点新道理，出点新思想，若能抛点新材料，更好。后面这一点不是人皆具备的，对党史研究来说，只有特殊部门、特别人物才有可能。但是，新视角、新道理、新思想，对于研究者来说，则是应当努力追求的。

常言道：“文章是自己的好。”我不这样认为，我问过的许多人也不这样认为。在党史界能写一手好文章的，很多；值得我们这些

人敬佩的大家,也很多。就我自己而言,虽然写了不少文章,但比较满意的并不多。写文章跟运动员参加比赛一样。运动员只有处于亢奋状态,才出好成绩;只有“打疯了”,才能所向披靡。写文章也只有在高度兴奋状态下,才爆发灵感,出新观点、新思想,犹如有“神”相助,笔上生花,既写得快,又写得好。但是,这样一篇文章写下来,很累人,食无味,睡难眠,故“衣带渐宽”。

收入在本书中的《对历史伟人的历史比较》、《周恩来——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的又一历史伟人》、《刘少奇与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之缘》、《冷峻而伟大的思想者——张闻天》、《统一战线思想发展的特殊岁月》、《党的八大与党领导的二十世纪中国的两次伟大革命》、《历史回眸:艰辛与辉煌,经验与启示》和《“三个代表”思想: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新总结》等文,大体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一些年轻同志常问我:你写文章有什么体会,你的那些文章是怎么写出来的?我答曰:写文章是苦差事,但写好了,苦尽甘来,乐在其中。好文章往往为呕心沥血之作。在“山穷水尽疑无路”时,只要“呕心沥血”一番,总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获。这只是我个人的感受,不具普遍性,因为我不属于那种才气横溢者,写好文章从来没有那种不费气力的轻松感。

(七)写就的所谓呕心沥血之作,除了开篇布局、起承转合、思想表述、文字润色等用了些心思外,主要是创新意识得到了强化,琢磨了些新观点、新说法,多少能给人点新鲜感。我更看重的是这一方面。比如:

在《“三个代表”思想: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新总结》中,有这么两点是动了些脑筋的。一是在正题下加了个副标题“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南方谈话’”。这是有意为之。我是很看重“三个代表”这个思想的。文章论述了它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虽然没有展开,但比喻为“南方谈话”,一语双关,其意在不言中。它虽